

西方哲学史

基督教信仰与希腊哲学的思想张力

赵 林/文

提 要：当基督教脱离犹太教母体、开始在希腊—拉丁世界中传播时，如何处理新兴的基督教信仰与具有深厚思想传统的希腊哲学之间的关系，这是摆在基督教护教士们面前的一个理论难题。在初期教会中，诺斯替主义表现出了一种“急性希腊化”的做法，即试图将基督教信仰改造成一种玄奥的二元论哲学。与这种异端做法不同，正统教会在对待上述关系时表现出了两种态度：或者用基督教信仰来统摄希腊哲学，或者用基督教信仰来拒斥希腊哲学。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态度，都在有意或无意之中把希腊哲学、尤其是具有神秘色彩的柏拉图主义融入到基督教信仰中，从而形成了最初的神学理论。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希腊—拉丁世界的基督教化这个表象背后，隐蔽着一个更加深刻的思想转化过程，这就是基督教信仰（以及教会体制）的希腊化与拉丁化。

关键词：基督教信仰；希腊哲学；诺斯替主义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交融，往往是以一种文化互渗和融合更新的方式进行的。例如，在印度佛教东传的过程中，一方面对东汉魏晋以降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中国经历了“开宗判教”和“援儒入佛”的本色化改造，最终的结果，不仅氤氲化生了华严、天台、禅宗、净土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宗，而且也融合更新出儒佛互补的宋明理学。同样，自从亚历山大东征开创了希腊化时代以来，一方面是希腊文化向东方疆域（小亚细亚、西亚、埃及等地）的强势扩展，另一方面则是东方文化对希腊罗马世界的潜移默化的浸润渗透，这种文化互渗的结果导致了一种文化新品种的出现——一个根植于东方阴郁苦难的现实土壤中的彼岸性宗教，在充分吸收了希腊深邃神秘的形而上学思想和罗马规范严整的社会组织体系之后^①，最终在西方土地上发展壮大为一统天下的主流宗教（基督教）。

^① 罗素在谈到罗马天主教会文化渊源时指出：“它的圣教历史是犹太的，它的神学是希腊的，它的政府和教法，至少间接是罗马的。”（罗素，1963：绪论19）源于犹太圣教历史的基督教从深邃玄奥的希腊形而上学中吸取了大量的思想营养，从而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神学体系。至于罗马教会与罗马帝国的关系，虽然二者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里处于一种充满张力的对立状态，但是罗马教会在中世纪欧洲所要实现的政治理想不过是对当年罗马帝国不世雄风的旧梦重温，而罗马教会的组织结构和法律规范都是对罗马帝国模式的效仿。

时至今日,当源于西方的基督教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演化时,同样也面临着如何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更新的问题。反思基督教信仰与希腊哲学之间的思想张力,对于汉语神学未来的发展演进,无疑将具有重要的文化启示意义。

一、基督教的“急性希腊化”与“慢性希腊化”

公元1世纪上半叶,当基督教从西亚传入希腊罗马世界时,它必须面对比希伯来文化具有更高发展水平的希腊文化。为了能够在文明的希腊-拉丁世界中传播基督教的福音,保罗等使徒采用了在地中海东部地区通用的希腊语,并且参照斐洛等人的做法,借鉴影响广泛的希腊哲学来解释基督的福音^②。但是保罗等人的目的毕竟是要传播新兴的基督教福音,而不是发扬光大希腊哲学,因此在如何处理基督教信仰与希腊哲学的关系上,保罗以及稍后的教父们都面临着一种文化挑战。虽然基督教神学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希腊哲学思想,但是在基督教信仰与希腊哲学之间始终存在着无形的思想张力。这种张力使得基督教一方面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希腊哲学的许多思想(尤其是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却为了信仰的缘故而极力排斥具有较强理性色彩的希腊哲学。当保罗在希腊-拉丁世界中传教时,他常常借用柏拉图和斯多亚主义的哲学语言,他也承认在希腊哲学中包含着深刻的真理,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取代耶稣在死而复活的福音中所昭示的至高真理。“在保罗看来,理性的思考是重要的。没有它,非信徒和信徒都会面临灾难。哲学可以被使用,但不能代替信仰和门徒训练。哲学对保罗和其他《新约》作者而言,就像对后世其他许多伟大的基督徒一样,是一个好的仆人。”(布朗,2005:54)

公元64年尼禄皇帝开始对基督徒进行公开迫害之后,彼得、保罗等使徒纷纷殉道,基督教传播的使徒时代随之结束,教父时代则接踵而至。与出身于犹太人的使徒不同,教父们通常都是地道的外邦人,即希腊人、罗马人等。这种身份使得他们在调和“两希”文化方面比使徒更加得心应手。那些既具有深厚的希腊文化教养、又具有坚定的基督教信仰的教父们,在继承使徒遗愿继续传播基督教福音的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借用希腊哲学来为基督教神学进行理论奠基。在公元313年《米兰敕令》颁布、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获得合法性之前,教父们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受压抑的基督教信仰进行理论辩护。他们一方面将深刻的希腊哲学思想引入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和教义中,使基督教从一种朴素的信仰上升为一套深奥的神学;另一方面则力图说明基督教信仰与希腊哲学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从而凸显出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和至上性。教父们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柏拉图主义、斯多亚主义等异教哲学中吸取精神养料的同时,也对希腊哲学进行了神秘化改造,使其得以成为基督教信仰的“好仆人”。换言之,他们正是在对希腊哲学进行“基督教化”改造的过程中,完成了基督教自身的“希腊-拉丁化”转型。

基督教“希腊化”的一种极端形式就是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诺斯替主义是公元1

^② 早在公元1世纪初,一位深受希腊哲学影响的犹太教徒斐洛(Philo,约公元前25—公元50年)就开始在当时的希腊文化中心——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进行融合“两希文化”(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工作。他试图用柏拉图主义来改造犹太教信仰,用“逻各斯”等希腊哲学概念来重新诠释犹太教经典《创世记》中的上帝创世和拯救计划,将圣经《旧约》从一部直观的纪实历史典籍隐喻为一部理性堕落与复归的精神启示录。虽然斐洛本人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力图用希腊哲学来改造犹太教信仰的做法,对于早期基督教会的使徒和教父们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影响。

至2世纪流行于地中海世界的一个神秘主义教派，许多诺斯替主义者都是有学问的希腊知识分子，他们试图用一种柏拉图式的灵肉二元论来重新阐释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诺斯替主义主张斩断基督教的犹太历史传统和《旧约》根基，用精神与物质、善与恶的二元论哲学来说明世界的沉沦与拯救。基督教的诺斯替教派宣扬有两位神：一位是创造物质世界的巨匠，他是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的统治者；另一位则是“隐蔽的”、“无法理解的”和“异乡的”神，他是仁慈和善的化身，是光明的精神世界（“普累若麻”，pleroma）的主。诺斯替教派否认大公教会关于道成肉身、基督受难、肉身复活等正统教义，认为基督显现为人形只是一个幻影（“幻影说”，docetism），基督只是借用耶稣的形象和事迹来完成他的拯救工作。“基督把我们这个世界以及它的神那里拯救出来，以便让我们做新的异乡神的孩子。”（约纳斯，2003：172）从黑暗邪恶的物质世界回归到光明圣洁的精神世界的道路是由一位完全灵化的基督指引的，而基督的救恩需要通过一种神秘的真知（gnōsis）来实现。这真知是一种与参与教会和禁欲冥想相联系的宗教实践，而不是在书斋中所进行的冷静思辨。诺斯替教派混合了地中海世界乃至波斯、印度的许多神秘主义因素，但是它的哲学基础主要还是柏拉图主义关于理念世界与感觉世界相对立的二元论思想，并且与基督教的罪恶与救赎的教义密切相关^③。亨利·查德韦克认为诺斯替主义是一个融汇了东西方各种宗教和哲学的大杂烩：

在其思想体系中，秘教、东方神秘主义不但与占星术、巫术、犹太教传统哲学相糅合，还吸收了带有悲观情调的、关于人的真正家园并非寓于有形世界之中的柏拉图学说，尤其掺进了基督教中关于基督救赎的认识和理解。另外，精神与物质、心灵与肉体的二元论，以及有着强烈影响的决定论或前定论，也在该思想体系中融为一体。（麦克曼勒斯，1995：41）

诺斯替教派最主要的思想是精神与物质、善良与罪恶相对立的二元论，以及关于基督拯救沉沦的灵魂超脱有形世界、回归精神世界的理论，这些思想无疑是柏拉图主义（以及波斯摩尼教的二元论世界观）与基督教信仰直接结合的结果^④。从精神实质上看，诺斯替主义明显地表现了一种试图斩断基督教的历史根源、将上帝和基督过分灵性化的特点（诺斯替主义也因此被称为“灵智派”），这恰恰体现了基督教力图与希腊化世界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希腊哲学相融合的倾向。虽然诺斯替主义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印度、波斯等东方地区，但是当它在公元之初流行于地中海世界时，它已经被深深地打上了希腊化时代的宇宙城邦主义的文化烙印。与犹太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一样，诺斯替主义最初在希腊世界中也是一种新事物。但是，当诺斯替主义与基督教信仰相融汇之后，诺斯替教派与正统教会却在面对希腊文化挑战时采取了不同的应战姿态。现代教义史家哈纳克把诺斯替主义者称为“最早的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他们用希腊哲学术语来曲解基督教思想，表现了基督教的一种“急性

^③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斐洛就属于诺斯替教派，或者是该教派的思想先驱。诺斯替教派像斐洛一样借助柏拉图主义来诠释《圣经》，只不过他们的着眼点不是《旧约》而是《新约》，不是亚当而是基督。而且相比起斐洛来，诺斯替教派的思想显然更加玄奥神秘，也带有更明显的文化杂糅特点。

^④ 美国著名教会史家沃尔克认为，诺斯替派关于现象世界与精神世界相对立的基本思想“是柏拉图学说与波斯二元论的结合”，“它又在基督教中发现很多可以利用的东西，尤其是基督这个人物被改造后，成为它关于更高级的使人得救的知识之理论的明确而具体的核心。”（沃尔克，1991：64—65）

希腊化”倾向（参见 Harnack, 1961: 228—229）。与此相对，正统神学以《圣经》传统和使徒教诲为根据的教义奠基工作则表现了基督教的“慢性希腊化”过程。如果说基督教大公教会的基本回应是力图将希腊哲学基督教化（其极端一翼甚至试图用基督教信仰彻底否定希腊哲学），那么诺斯替主义的做法则是要把基督教信仰改造为一种二元论哲学。二者都试图融合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信仰，但是双方的努力方向却正好相反。正因为如此，尽管诺斯替主义为后来的基督教神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它仍然被大公教会斥为异端（而且是“最早与最危险的异端”）。事实上，所谓“正统”最初正是针对诺斯替“异端”而言的。“2世纪的基督教领袖和思想家，花了很大的精力来研究与驳斥这个异端，并且在这过程中开始建立了正统的基督教教义，来对抗诺斯替主义的教导。换句话说，我们所谓的‘正统’诞生于使徒指定的继承人与诺斯替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奥尔森，2003：26）

与诺斯替主义的异端思想相比，基督教正统神学在对待希腊哲学的态度上显然要审慎得多，它在对待基督教的《旧约》根源和历史传统方面也更为保守。但是，由于希腊哲学在当时被确立为希腊化世界的最高层次的文化形态，而基督教信仰却在罗马帝国被大多数人看做一种东方的低级迷信，因此，如何处理基督教信仰与希腊哲学的关系，就成为基督教能否在希腊—拉丁世界中安身立命乃至发扬光大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既然已经排除了诺斯替主义的“急性希腊化”做法，那么大公教会的“慢性希腊化”策略就只能是用基督教信仰来潜移默化地统摄和消融希腊哲学了，其结果就导致了基督教正统神学的确立以及影响深远的教义分歧。

二、希腊教父对希腊哲学的包容

在基督教合法化之前，教父们的主要使命是护教。护教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反驳希腊—拉丁世界的异教思想家们对基督教的诽谤和攻击，二是谴责基督教内部的种种异端思想，捍卫“正确的信仰”。在进行上述两个方面的工作时，教父们一边吸取深刻的希腊形而上学思想来加强基督教信仰的理论底蕴，另一面却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希腊哲学流派——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怀疑主义甚至新柏拉图主义——进行批判，力图说明基督教是高于一切希腊哲学的真正哲学。早期大公教会的教父们对待希腊哲学的态度，可以划为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主张用“基督教哲学”来包摄、容涵希腊哲学，在二者之间寻求同一性。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是一些具有深厚哲学修养的希腊教父，如查士丁、克莱门特、奥利金等人。另一派则主张用基督教信仰来彻底否定和对抗希腊哲学，该派人士多为信仰狂热的拉丁教父，如德尔图良、拉克唐修等。然而，无论是哪一派，实际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吸取了大量的希腊哲学成分，从而为基督教神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著名的希腊护教士殉道者查士丁（Justin，约100—162年）第一次提出了“基督教哲学”的概念，他认为希腊的一切哲学都是指向基督教哲学这一最终目标的。他在《护教篇》中对希腊哲学的“逻各斯”（或“道”）概念进行了基督教化的阐发，认为基督就是“逻各斯”或“道”。在基督化为人形即“道成肉身”之前，“逻各斯”就体现为宇宙的理性规律，它已经被一些智慧的希腊哲人所意识到。查士丁写道：“基督是上帝的头生子这一点已被教授给我们，并且我们在上文中已宣告他是每个种族的人都分有的道。那些遵循道而生活的人就是基督徒，哪怕他们已被视作是无神论者，例如，在希腊人中，苏格拉底和赫拉克利特以及与他们相像的人。”（Roberts & Donaldson, 1994a: 178）他认为，鼓舞苏格拉底赴死

的那个“灵异”后来就化身为基督，因此苏格拉底、柏拉图与基督徒所崇拜的是同一个上帝。差别仅仅在于，苏格拉底等希腊哲学家只是“部分地”认识了“道”，他们只看到了“道”所启示的真理，并未见到“道”本身；只有当“道成肉身”，化作基督之后，基督徒们才能完全地认识“道”。因此相对于希腊哲学而言，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哲学，只有它才能认识到绝对的真理。查士丁这种极力用希腊哲学的“逻各斯”概念来说明基督身份的做法，使他成为“逻各斯－肉身基督论”（Logos-flesh Christology）的重要代表，并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亚历山大学派的神学家们。

公元前2世纪以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成为希腊化世界的文化中心。到了罗马帝国时期，亚历山大城不仅是学园派哲学和诺斯替主义盛行的重镇——斐洛和普罗提诺等人都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而且也是基督教神学生长的沃土。“欧洲神学是2世纪护教学家们调和基督教与希腊诺斯替派哲学，在亚历山大城的海道学校中孕育出来的，这是欧洲思想史的奇特的序曲。”（希尔，2007：4）亚历山大学派的神学家们继承了查士丁等希腊教父的思想传统，并且融汇了柏拉图主义、斯多亚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诺斯替主义等各种思想资源，致力于把深邃的希腊哲学与狂热的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其代表人物就是公元2—3世纪的两位著名教父克莱门和奥利金。

长期担任亚历山大基督教海道学校（Catechetical School）校长的克莱门（Clement，？—约215年）被时人称为精通希腊思想的“博学多才者”和“独一无二的基督教思想家”。他在《劝勉希腊人》中一方面对希腊多神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那是一种落伍的低级迷信，充满了淫乱和愚昧的色彩；另一方面却从柏拉图哲学和希伯来先知书中发掘出关于上帝救赎的伟大计划，号召希腊人远离邪灵而追随基督。他以精致的修饰和雄辩的文风对希腊的神秘宗教（多神教）、偶像崇拜、传统习俗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同时也对希腊哲学和希腊诗歌中所隐含的真理成分予以澄清。克莱门对希腊自然哲学把水、火、土、气、原子等物质性元素推崇为神或本原的“愚蠢观点”进行了嘲讽，但是他却认为在希腊哲学家中间并非没有具备真知灼见者，这就是柏拉图。柏拉图不仅在《蒂迈欧篇》中明确表述了上帝是一位无法言说的宇宙之父和创造者（参见柏拉图，2003：280），而且更重要的是，柏拉图关于上帝的真知灼见“还是受益于希伯来人本身”（克莱门，1995：104）。此外，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安提斯提尼以及斯多亚主义的某些哲学家也都或多或少朦胧地认识到了唯一神圣的上帝。

在另一篇著作《杂记》中，克莱门详细论述了基督教信仰与希腊哲学的关系。他认为，在耶稣降临之前，上帝正是通过哲学让希腊人领悟到他的救赎计划。“也许哲学最初直接被赐给希腊人，直到主呼召希腊人为止。因为哲学是教师，将希腊人带‘到基督面前’，正如律法将希伯来人带‘到基督面前’一样，所以，哲学是一种预备，为那些将在基督中被完善的人铺平道路。”（Roberts & Donaldson，1994b：305）与他的神学对手德尔图良强调“哲学导致异端”的观点针锋相对，克莱门坚持认为哲学可以帮助基督教来对抗异端，而对逻辑和辩证法弃之不用才是致使心智混乱的重要原因。克莱门与查士丁一样强调“逻各斯”或“道”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一个理想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真正的诺斯替主义者”，完全听从“道”的指导而效法神。

克莱门的思想通过他的学生奥利金（Origen，185—254年）而得以系统化，并且发展出一套具有“异端”嫌疑的神学理论。在致力于调和基督教信仰与希腊哲学这方面，奥利金堪称早期教父中最重要的思想家。奥利金曾对罗马异教哲学家塞尔修斯指责基督教是无知与

迷信的宗教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驳斥,他认为基督教提供了希腊哲学无法提供的拯救知识,因此基督教超越了一切哲学而成为一种“神圣的哲学”。但是在奥利金对基督教教义——如三位一体、基督位格等——的奠基和解释中,却充满了希腊唯心主义甚至诺斯替主义的灵化观点,明显表现出斐洛的寓意释经法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奥利金的“灵魂先存论”不仅深受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而且与斐洛和诺斯替主义也有着内在的精神默契;而他关于圣父、圣子、圣灵的神学“次位论”,则与他的同门、新柏拉图主义代表人物普罗提诺关于太一、努斯、灵魂的哲学辩证法具有明显的理论同构性^⑤。

奥利金是一个坚定而虔诚的基督徒,他不仅曾经鼓励自己的父亲为信仰而殉道,而且他本人最后也是死于罗马统治者的迫害。尽管如此,他对希腊哲学却颇为热衷并且具有极高造诣。虽然奥利金曾经明确地表示,哲学与几何学、音乐、文法等一样,都不过是“神学的婢女”,但是后世仍然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一个把理性置于信仰之上的基督教理性主义者。当代自由主义神学家蒂利希援引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的观点,认为奥利金用希腊思想来解释《圣经》,使之“希腊化了”(参见蒂利希,2008:58)。沃尔克对奥利金的思想成就评论道:

长期以来用希腊化思想解释基督教真理的工作到奥利金手中终于最后完成。他使基督教体系具有他那个时代的最充分的科学地位,那时的科学几乎全部包含在哲学和伦理学之中。他的哲学观点基本上是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主义的,但明显地倾向于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柏拉图主义……他刻意探索这种种哲学原理与《圣经》的协调一致……在此基础上奥利金建立起他的庞大的神学体系——信仰之上再加上知识,用这种方法去解释基督教。(沃尔克,1991:93—95)

奥利金由于坚持用希腊语写作,并且继承和发扬了查士丁、克莱门等人的注重哲学和理性的思想传统,因此他的思想在西方教会中一直不受主流神学的欢迎。他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一些观点,如“灵魂先存论”、“次位论”、“赎价论”等^⑥,后来都被大公教会斥为异端。尽管如此,他的思想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基督教世界中的许多重要人物。奥尔森指出:“几乎所有正统大公教会定罪的异端,最终都怪罪到他的头上”,另一方面,“许多最伟大的正统英雄,也深受奥利金及其教导的影响”。(奥尔森,2003:92—93)

三、拉丁教父对希腊哲学的拒斥

与希腊教父们极力使基督教信仰与希腊哲学相协调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一些拉丁教父

^⑤ 据普罗提诺的学生波菲利记载,奥利金与普罗提诺同为新柏拉图主义创造人 A. 萨卡斯 (Ammonius Sakkas) 的学生。奥利金有一次还突然出现在普罗提诺的课堂上,弄得后者“面有赧色”(参见肯尼,2006:49—50)。

^⑥ “灵魂先存论”(pre-existentialism)认为,上帝在太初创造的都是有理性的灵魂,但是灵魂后来却由于自由意志而偏离了理性,沉沦于肉体之中。为了拯救沉沦的灵魂,基督作为神性的逻各斯而道成肉身,引导悔改的灵魂脱离罪恶的形体,复归善良纯粹的灵性世界。“次位论”(Subordinationism)认为,惟有圣父是自因的和非被生的,圣子虽然与圣父同质,但却是从圣父本质中所生,因此其荣耀次于圣父;而圣灵则是被圣子永恒地创造出来的,其荣耀又次于圣子。“赎价论”(ransom theory)认为,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上帝偿还给魔鬼的赎价,耶稣之死只是一个障眼法,欺骗了魔鬼。

表现出一种用基督教信仰来彻底否定希腊哲学的倾向，力图使基督教与一切哲学划清界线。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145—220年）。德尔图良不仅是最早使用拉丁文写作的基督教思想家（当时全罗马帝国境内的教父们都是用希腊文写作的），而且也是率先使用“三位一体”、“圣礼”、“补赎”、“善功”等神学术语的人。他关于“三位一体”、“基督神人二性”的神学思想，后来被尼西亚会议等基督教大公会议确立为正统教义；他关于罪与恩典的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教会思想巨擘奥古斯丁。德尔图良是一个精通希腊哲学、罗马法律同时又具有狂热信仰的清教主义者，在他身上，斯多亚主义和孟他努主义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⑦。他不仅热忱地鼓励基督徒为信仰而殉道，宣扬“基督徒的鲜血成为教会的种子”；而且号召基督徒们拒绝从军、任教和担任公职，抵制异教的各种文化活动（如崇拜偶像、看戏、参加公共庆典和竞技活动等）。尽管德尔图良在思想上和德行上都深受斯多亚主义的影响，但是他却对希腊哲学进行了全盘否定。与克莱门关于理想的基督徒应该是一个“真正的诺斯替主义者”的断言针锋相对，德尔图良认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心无旁骛地恪守《圣经》、使徒教诲和教会规则，对异教的哲学和其他文化形态嗤之以鼻。他明确地表示，基督教是上帝的福音，而哲学则是“魔鬼的学说”，它以一种歪曲的方式来解释上帝的旨意。各种与基督教正统信仰相对立的异端思想，都是由哲学教唆出来的，因此应该彻底抛弃一切哲学，以纯洁基督教信仰。针对查士丁等希腊教父把基督教看作是一种更高的哲学的观点，德尔图良告诫人们“不能将基督教视为一种哲学”，他以法学家的雄辩风格说道：“在基督徒与哲学家之间有何相似之处？在希腊的门徒与上天的门徒之间……在真理的蠹贼与其护卫者之间，又有何相似之处呢？”（德尔图良，1999：93、96。）在《论禁止异端》中，这位狂热的教父更是激忿地写下了这段著名的文字：

雅典与耶路撒冷究竟有何关系？学园与教会有何相干？异教徒与基督徒之间有什么一致之处？我们的教导来自于“所罗门之廊”。所罗门自己曾教导说：“应该以纯粹之心寻求主。”让那些试图将斯多亚主义、柏拉图主义、辩证法与基督教信仰相混杂的做法滚开吧！在拥有了基督耶稣之后我们不需要好奇的争辩，在享受了福音之后我们不需要质疑！有了信仰，我们不再渴求任何信念。因为这是我们得以配享最高荣耀的信仰，除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应该相信的。（Roberts & Donaldson，1994c：246）

正是这位偏激的拉丁护教士，在论述基督被钉十字架和死而复活的问题时，表达了一个西方哲学史上的著名观点：“正因为其荒谬，所以我才相信。”^⑧ 德尔图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由于人类理性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所以根本不可能洞见上帝的奥秘。要想认识无限的本体或上帝，人类惟一可以依靠的手段只有信仰。理性是人类制定的准则，信仰却是基督制定

^⑦ 孟他努主义（Montanism）是公元2世纪与诺斯替主义并存的早期基督教两大异端之一，因其创造人和先知孟他努（Montanus）而得名。该派反对大公教会的权威和世俗化倾向，宣扬圣灵格外降临的预言，提倡禁欲苦修和脱俗出世。德尔图良晚年因受孟他努主义的影响而与大公教会断绝关系，并对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⑧ 德尔图良在《论基督的肉身》中说道：“上帝的儿子死了；这务必应该相信，正因为它是荒谬的。并且他被埋葬，又复活了；这个事实是确凿无疑的，正因为它是不可能的。”（Roberts & Donaldson，1994c：525）

的准则,如果基督教的教义(死而复活、三位一体等)在理性看来是荒谬的和不可能的,这恰恰说明了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在这里,应该受到指责的不是奥秘的教义,而是理性本身。因为理性太狭窄,无法容纳博大精深的基督教真理,正如同一个狭小的器皿无法装下汪洋大海一样。

无独有偶,另一位著名的拉丁教父拉克唐修(Lactantius,约260—330年)也表现了同样的思想倾向。在其代表作《神圣原理》的第3卷《论哲学家的伪智慧》中,拉克唐修对希腊哲学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他列举了大量材料来说明,希腊哲学表面上鼓吹善和美德,实际上却滋生出种种罪恶的行径——伊壁鸠鲁主义“倡导最可耻的快乐”,助长了人们及时行乐的堕落之风;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斯多亚主义关于不朽的灵魂在不同肉体中轮回转世的观点,鼓励了自杀的倾向;柏拉图的理想国貌似平等,实际上他的废弃婚姻和财产的建议却取消了贞洁和正义的美德,导致了通奸、纵欲和纷争(“没有比许多男人共有一个女人更会引起激烈冲突的原因了”)。至于一直被奉为希腊哲学和道德典范的苏格拉底,虽然比一般人都要聪明得多,但是他的许多行为仍然是愚蠢的,例如他临死前还念念不忘要向医神埃斯库拉庇乌斯(Aesculapius)献上一只公鸡,这种低级的迷信“不是极端无聊的标志吗”?拉克唐修把罗马社会中盛行的各种奢靡放荡现象都归咎于希腊哲学,并且通过揭露罗马人的腐化堕落行径,反衬出基督徒的崇高道德境界。拉克唐修和德尔图良一样认为,“哲学家的教导远远地偏离了真理”,“整个哲学都是虚假的和空洞的,既不能使我们明了公义的职责,又不能增强人生的义务和明确人生的道路”。(拉克唐修,2005:183)虽然“哲学”一词的字面意思是“爱智慧”,但是希腊哲学却远离了它的本意,而真正的智慧只存在于对上帝的宗教信仰中。拉克唐修明确地表达了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对立:

所有哲学家终生都在探索,然而却不能考察、把握、获得它(指真正的智慧——引者),因为他们或是维护一种腐败的宗教,或是完全取消宗教。因此,让他们全都走吧,他们不指导人的生活,而是使之陷入混乱。他们不能教导自己,又能拿什么来教别人呢?他们又能教育谁呢?病人能治病吗?盲人能指路吗?因此,让我们这些尊敬智慧的人自己来探讨这个主题……。

瞧!天上有一个声音在教导真理,向我们展示一道比太阳还要明亮的光芒……我们在推翻一切伪宗教、驳斥所有习惯上或可能用来保护这些宗教的论证、证明了哲学体系是虚假的以后,现在必须走向真正的宗教和智慧。(拉克唐修,2005:229—230)

从思想背景而言,德尔图良、拉克唐修等拉丁教父与克莱门、奥利金等希腊教父一样,都具有深厚的希腊学养。他们对希腊哲学和异教文化的激烈攻击并非由于学术上的无知,而是出于信仰上的狂热。他们在批判异教文化时所使用的逻辑推理、修辞方法、思想原理甚至基本术语,都来源于希腊哲学;他们在论证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性和至上性时,往往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某些希腊哲学家、尤其是从柏拉图和斯多亚主义者那里寻找一些思想依据。著名教会史家冈察雷斯在谈到德尔图良的思想矛盾时指出:“尽管德尔图良明白地、反复地表示反对哲学在信仰问题上的渗入,但实际上——也许他不自觉——他自己经常受着斯多亚主义的影响,甚至他对辛尼加(Seneca)的评价是很高的,而这一点,与他一贯反对异教哲学观点的态度是正相矛盾的。”(冈察雷斯,2002:144—145)然而,从护教的强烈愿望出发,

再加上某种拉丁文化教养所特有的偏执态度（与希腊文化教养的宽容风格迥然而异），德尔图良等拉丁教父在基本立场上始终是自觉地、旗帜鲜明地反对异教哲学和一切文化形态，通过攻击希腊哲学的空洞荒谬来彰显基督教的崇高真理。事实上，德尔图良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基督教与异教哲学之间的矛盾就是信仰与理性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后来成为贯穿整个基督教思想史的基本矛盾。

希腊教父与拉丁教父之间的这种思想分歧——它典型地表现在克莱门和德尔图良对待希腊哲学的对立态度上——后来在历届大公会议的正统与异端之争中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由此埋下了东、西方教会大分裂的种子。奥利金等人的观点后来虽然被基督教大公会议斥为异端，但是在东派教会中却流传甚广，影响了阿利乌、阿塔那修斯等许多重要的神学家。然而在西派教会中，德尔图良等拉丁教父的观点却明显占了上风，并且被大公教会确立为正统神学教义。从尼西亚大公会议一直到查尔西顿大公会议所谴责的异端思想，如阿利乌派（Arianism）、阿波利拿里派（Apollinarianism）、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和一性论派（Monophysism）等^⑨，基本上都出自于东部教会，这些异端思想或深或浅都打上了希腊哲学的烙印。另一方面，随着罗马帝国在政治上的分裂以及日耳曼蛮族对西罗马帝国的入侵，西欧封建社会与东欧拜占庭帝国渐行渐远，西派教会与东派教会也日益分道扬镳。在这种情况下，希腊文化在拉丁-日耳曼社会中的影响逐渐式微，希腊哲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如“逻各斯”、“世界理性”等，也在罗马天主教会的神学思想体系中逐渐淡化^⑩。思想的分歧再加上权力的角逐，就使得东派教会与西派教会之间的关系愈益紧张，最终酿成了1054年希腊正教会（Orthodox Church，即东正教会）与罗马公教会（Catholic Church，即天主教会）之间的公开决裂。

虽然从表面上看，羽毛丰满的大公教会越来越有意识地排斥希腊哲学，然而后者的思想内涵却已经在基督教生长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无形地融入基督教神学中，熔铸成为基督教神学的精髓魂魄。在13世纪之前，基督教神学中占主流地位的奥古斯丁主义被打上了深深的柏拉图主义烙印；到了13世纪以后，后来居上的托马斯主义更是具有浓郁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色彩（参见赵林，2005）。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关系，就如同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一样，西方历史上甚嚣尘上的排犹主义主张并不能斩断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密切的血脉关系，同样，鼓噪一时的反异教呼声也无法消除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之间内在的精神联系。

⑨ 阿利乌派由亚历山大里亚神父阿利乌创立，主张基督是上帝的受造者，并不具有完全的神性，只具有完全的人性。阿波利拿里派由叙利亚老底嘉主教阿波利拿里创立，主张基督是以神性的逻各斯为其心灵，只具有神性而无完全的人性。聂斯脱利派（又称“二性二位论”）由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创立，主张基督具有神和人这两种本性，但是二者并不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位格，而是分别形成神、人两个不同的位格。一性论派为君士坦丁堡隐修院长优迪克（Eutyches）等人所倡导，认为基督的人性已经完全溶入神性之中，故而只有一个本性，即神性。

⑩ 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六、七百年间，希腊哲学在西欧社会中逐渐被淡忘。在蛮族入侵的“黑暗时代”和封建社会的早期阶段，由于古典文明的损毁和理性精神的衰弱，罗马天主教会在运用基督教信仰对日耳曼蛮族进行最初的文明教化时，营造出一种超理性甚至反理性的唯信主义精神氛围。一直到十字军东征在客观上重新打开了东西方文化通道，以及西班牙摩尔人的中介作用，闭目塞听的天主教思想界才再次领略到希腊哲学的博大精深，结果就导致了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天主教经院哲学和大学讲坛中的强劲复兴。

参 考 文 献

- 奥尔森, 2003, 《基督教神学思想史》, 吴瑞诚、徐成德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柏拉图, 2003, 《柏拉图全集》, 第3卷, 王晓朝译, 人民出版社。
- 布朗, 2005, 《基督教与西方思想》, 第1卷, 查常平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德尔图良, 1999, 《护教篇》, 涂世华译,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 蒂利希, 2008, 《基督教思想史——从其犹太和希腊发端到存在主义》, 尹大贻译, 东方出版社。
- 冈察雷斯, 2002, 《基督教思想史》, 陈泽民等译, 金陵协和神学院。
- 克莱门, 1995, 《劝勉希腊人》, 王来法译,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 肯尼, 2006, 《牛津西方哲学史》, 韩东晖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拉克唐修, 2005, 《神圣原理》, 王晓朝译, 道风书社(香港)。
- 罗素, 1963, 《西方哲学史》, 上卷, 李约瑟、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
- 麦克曼勒斯, 主编, 1995, 《牛津基督教史》, 张景龙、沙辰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 沃尔克, 1991, 《基督教会史》, 孙善玲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希尔, 2007, 《欧洲思想史》, 赵复三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约纳斯, 2003, 《诺斯替宗教——异乡神的信息与基督教的开端》, 张新樟译, 道风书社(香港)。
- 赵林, 2005,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奥古斯丁主义与托马斯主义》, 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 Harnack, A. von 1961, *History of Dogma*, Dover Publications.
- Roberts, A. & Donaldson, J. eds., 1994a, *Ante-Nicene Fathers*, vol. 1, *The Apostolic Fathers, Justin Martyr, Irenaeu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 Roberts, A. & Donaldson, J. eds., 1994b, *Ante-Nicene Fathers*, vol. 2, *Fathers of the Second Century: Hermas, Tatian, Athenagoras, Theophilus, and Clement of Alexander (Entire)*, Hendrickson Publishers.
- Roberts, A. & Donaldson, J. eds., 1994c, *Ante-Nicene Fathers*, vol. 3, *Latin Christianity: Its Founder, Tertullian*, Hendrickson Publishers, p. 246.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 鲁旭东)

Tension between Christian Faith and Greek Philosophy

Zhao Lin

When Christianity broke away from Judaism and started to be spread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the Christian apologists were faced with such a theoretical difficulty as to how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ly emergent Christian faith and the deeply-rooted tradition of Greek philosophy. In the early Church period, Gnosticism showed the tendency of “the acute Hellenization”, trying to transform Christian faith into a mysterious dualistic philosophy. Different from the Gnostic heresy, the Christian orthodoxy demonstrated two divided approaches to the difficulty. One approach was to put Greek philosophy under the dominance of Christian faith, and the other was to reject Greek philosophy in support of Christian faith. However, both approaches, whether unwittingly or not, blended Greek philosophy, especially Platonic mysticism, with Christian faith and gradually brought forth the original theological theory. This suggests that behind the Christianization process of the Greco-Roman world was an even more profound thought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aking place, namely, the process of hellenization and latinizat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the Church.

Property-Owning Democracy: Theory and Practice

Zhou Lian

John Rawls claims that property-owning democracy is one of two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institutions which can satisfy 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 he makes sharp distinction between it and welfare-state capitalism. However, in real political world, property-owning democracy has been one the most important ideologies of Britain conservative party since 1920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of versions of property-owning democracy by analyzing Noel Skelton, Antony Eden, Margret Thatcher and John Rawls's works and ideas.

“Initial Enlightenment” and “Anatta” : Subject and no-Subject Discrimination of Mind Philosophy of Buddhism

Zhang Zhen

The heart nature of “initial enlightenment” possess initiative of do-oneself, will-oneself, exercise-oneself and prevent-oneself, but this dynamic differs to the philosophy of subjectivity. “The initial enlightenment” negates the entity heart nature, emphasizing the sense of heart-sponsored in the living world and randomly absorbing species. In the “non-mirror” sight, what is done to think conscious with ones' awareness and not to catch heart with heart clears up broken integrity temporal with “self-consciousness” as fragmented. At the same time, “mind” which is not to be separated out of consciousness become “fourth time” of anatta, that is to say: “The initial enlightenment” built a non-objectifying behavior of non-target “subject”, which pronouns of virtual signified “subject”, and unity with Samantabhadra, and a constantly generate and create value, but also be a self-ablation “non-subject” and “subject”. This is not only for the Chinese Buddhist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s, but also has reference to 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subjectivity.